

#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叶以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叶以群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大致分为两部分：前面的十二篇杂文，从理論上和事实上駁斥了右派分子王造時、施肇基、許杰、石揮、王若望等在文艺問題及其他問題上对党的謾蔑。另外，再批判了梁实秋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論”。因为“人性論”的陰魂还在右派中飄浮不散。后面的四篇文章也是結合反右而寫的。其中兩篇是文艺論文，兩篇是紀念魯迅的。

在不平常的日子里

叶以群 著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總局第6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X1092 1/32 印张 3 1/8 字数 60,000

1958年10月第一版 1958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2,941-20,000

---

## 目次

|                                |    |
|--------------------------------|----|
| 封口战术.....                      | 1  |
| 也談“硬骨头”.....                   | 4  |
| 弦外之音.....                      | 6  |
| “志士仁人”的傳統及其他.....              | 9  |
| “宿怨”的来由.....                   | 12 |
| “宏道”与“宏文”.....                 | 17 |
| 施蛰存并未“做定了”第三种人.....            | 21 |
| 重談梁实秋的“人性論”.....               | 31 |
| 許杰的“小資产階級文艺”之旗.....            | 37 |
| 混淆是非的战术.....                   | 41 |
| 石揮所提倡的“傳統”是什么.....             | 51 |
| 恨和爱.....                       | 56 |
| 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               | 67 |
| 深入群众生活——社会主义文艺路綫<br>的主要环节..... | 76 |
| 發揚魯迅的革命精神.....                 | 88 |
| 假如魯迅先生活着.....                  | 93 |

## 封口战术

党号召各方面的人们向党提意见，批评党和党员的缺点和错误，揭露党群关系中的矛盾，帮助党整风。这可以看出党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团结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私的決心。这种精神的实质，就连某些西方报纸的记者也看得很清楚，承认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有信心”的表现；并且指出蒋介石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到崩溃途中，我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笔者）反攻复国的时机已接近成熟的阶段”是“白日作梦”，认为从人民中国“发出的新闻丝毫不足以支持蒋介石的演说”。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亲身体会着党广开言路、开诚倾听党外意见的精神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却竟出现了少数施展“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鲁迅语）的战术，企图以此封住别人的嘴的“战士”。“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杀共产党人，这不能算不爱国”，是一种战法；对不肯随风倒而提出一些公正意见的人投寄匿名恐吓信，指为“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是一种

战法；而把凡是反对他的意見的人們一律称为“霍尔蒂分子”、“反动集团”、“法西斯面孔”的，又是一种战法。

魯迅在二十五年前曾經說：“中国历来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吓、辱罵，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見这样的文章”，他建議“这一份遺產，还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艺家去承受罢！”遺憾的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經过了几个大轉折，而这种“遺產”竟还遺留在人民中国的少数大学教授、講師……身上。然而，历史畢竟是在前进的，此时此地的情况畢竟已不同于往昔，那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广大人民的眼睛是更加銳利、明亮了，对于那些乐于承受着这份“遺產”不肯放手，当作“傳家之宝”的人們的战术，在清醒的人民群众看来，除了暴露出他自己的“卑劣”而使人深感“污穢”之外，是不会有別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不怕人“辱罵”的，三十余年来，所听到的咒罵之声已經不少了，“洪水”、“猛兽”、“赤化”、“匪帮”……的罵声咒語曾經營营扰扰，而且余音至今还在台灣的上空繚繞。可是，历史是無情的，中国共产党沒有在咒罵声中削弱，而是空前地壯大起来了；而那种惡毒的咒罵之声却愈来愈微弱，終于成了不易为人所聞的蒼蠅、鼯鼠似的哀鳴了！这是千百万黃金、美元也挽救不了的命运。

中国进步的知識分子是不怕誣陷、恐吓的，几十年来，軍閥、官僚、特务、走狗的毆打、逮捕、投獄、屠杀，都沒有封住他們的嘴，不要說什么混淆黑白的造謠、誣陷或匿名恐吓信！更何况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之下？

中国革命的知識分子是經得住考驗的，过去，反动派的血腥統治尚不能使他們低头，今天，“辱罵和恐吓”也决不能封住他們的嘴！

誰是进步？誰是反动？——只有讓历史亲作証，讓现实来作証！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更將辨明是非，分清敌我，作出最公正的裁判！

讓我們大家用事实来証明究竟誰是“革命的人”，誰是“暗藏的外部分子”罢！，真理是决不会被“辱罵和恐吓”的战术所吓退的！

1957年6月10日

## 也談“硬骨头”

近来不仅有少数人把那些勇于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坚持倒退的“战士”們，称作“硬骨头”，也有絕少数人把昧于是非，頑固不化，誣蔑別人，抬高自己的“勇气”自翊为“硬骨头”。这实在沾污了中国民族傳統中的“硬骨头”三个字。

毛主席称赞鲁迅是“硬骨头”，是因为鲁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帝国主义、封建軍閥、国民党反动派、托派叛徒、特务、走狗……“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地冲鋒陷陣；他遇困难“不肯退轉”，对真理“鑢而不舍”，不肯以先入为主来固执己見，而願遵先驅者的命令。这正是鲁迅成为“中国的脊梁”、成为文化新軍的“旗手”的原因，也是鲁迅能从进化論者發展为階級論者，从民主主义者轉变为無产階級战士的根据。鲁迅的“硬骨头”就硬在奋勇前进，决不“退轉”，决不做“翻斤斗”的小資产階級。

那种勇于誣蔑別人，抬高自己，泯灭民族的良心，有背

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的“战士”們，算不算得“硬骨头”呢？算不得！秦檜是坚持誣蔑岳飛为“民族罪人”，并且到死不屈的，可是有一个史家能“标新立异”地大做翻案文章，把秦檜誉为“硬骨头”，并取信于人民群众嗎？这是不可能的。

顛倒是非地罵罵共产党，就能算是“硬骨头”嗎？算不得！蔣介石和他的走卒們誣蔑共产党为“賊”，为“匪”，为“民族叛徒”，为“赤色帝国主义”，不仅已有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而且到現在也还没有住口。有没有人能說他們是“硬骨头”呢？沒有。就連他們的主子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只是一群“不爭气”的奴才，“白日作夢”的小丑！

可見“硬骨头”是既不能自封，也不能由一小撮“同道者”互封的；誰是“硬骨头”，誰是“奴顏媚骨”？只有由历史来做判決，由全民族的大多数来做判決。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大多数人的眼睛不能蒙蔽，真理究竟是只能屬於一边的。不管你有怎样的“譁众取寵”的本領和“偷天換日”的巧术，能够騙得住人或騙得过人的，究竟只能如“曇花一現”，是非終究会大白于天下！那些泯灭良知，企圖乘隙起哄，爭取“群众”的野心家，終有一天会發現自己早已为群众所弃，而只是孤零零的“寡人”一个，有如荒島上的“將軍”，斗室中的“勇士”！

1957年6月2日

## 弦外之音

民盟的右派分子儲安平認為目前黨領導國家“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是“莫非王土”的“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是“黨天下”。他似乎很懷念解放以前毛主席倡議的“聯合政府”，他認為解放初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憲法，改組了政府之後，就不像“聯合政府”了。

關於目前的國家政權機構是不是“清一色局面”，是不是“黨天下”，我以為事實俱在，不值得反駁。只是，今天的人民政權已經不“像”當年毛主席所倡議的“聯合政府”，我們倒可以坦率地承認：確是如此，而且已經大不相同。身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應當不會不知道：從一九四五年四月毛主席發表“論聯合政府”到現在的十餘年之間，中國歷史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發展，我們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解放了整個大陸，完成了土地改革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進入了社會主義的建設。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

中就說得很明白：“在中国的現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經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我們共产党人从来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而今天，中国早已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管这些右派分子对于往昔的怀恋，历史却是决不会倒退的。

这种貌似糊涂的怀恋往昔，其实并不是真的表現他們怀念毛主席所倡議的“联合政府”，而只是暴露着他們向往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度而已！如果不信，請看他們“自家人”的补充：一个說，無产阶级專政是三个主义的根源，要除“三害”，必須取消無产阶级專政；一个說，在国家机关中有了党派組織活动，多一層身分就多一層关系，也就多一層产生矛盾的机会。这些說法尽管各有巧妙，拆穿来看，却只有一个内容，那就是：不要無产阶级專政，不要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退出一切国家机关；还有一个就說得更加“老实”了，他主張“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輪流执政”。那么一“輪”，自然就可能輕易地变成右派分子的“党天下”了！

这还不算妙想天开，更妙的是“民盟”副主席章伯鈞的幕后策划。他“面訓”他的干部說，民主党派今后要發展到几百万，“最好搞一个上議院”。这就聞其声如見其人，使人對他們的面貌看得更加分明了！虽然，摸不清他們想搞的是“元老院”还是“貴族院”，但反正他們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兩院制”，这

一点灵魂深处的老根的性質，是無可隱蔽的！

这种幕后的策划已經够“深刻”的了，于是上海的右派重要人物、“自由出版社”的創辦人王造时就进一步發揮了他們的“理論根据”，他“披肝瀝胆”地說：“美国的法治是認真的。美国的法治精神仍有好些地方可以采取。”一向关怀美国，至今犹在贊揚美国法治精神的王造时当不会不知道美国有个臭名远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几年来建立了不少的“助業”，許多正直的作家、戏剧家、电影的导演和演員——例如卓別林，奧德茨（“千金之子”作者），夏姆林（“守望萊茵河”导演），保罗·罗伯遜，爱德华·魯賓遜，佛德立·馬驅，艾尔·罗宾遜，戴·夏蕙蘭等，都曾被列入黑名單之內，不是被控告、被罰款，就是被迫失業；卓別林甚至被逼得在美国無立足之地，發誓不再回美国，他的新片不仅在美国不能放映，連在受“美援”控制的国家，例如法国，也遭到了禁映。这就是美国的“法治精神”！深知美国如王造时的，能够說明这个“非美活动委员会”是根据美国宪法哪一条的“精神”而产生的嗎？

这一切右派分子的形形色色的花言巧語，說穿了只有一个內容、一个目的，那就是借“帮助共产党整風”之名，乘机表达他們抑压了几年的“心声”——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企圖將中国的历史拉回到資产階級“民主制度”的老路上去。

可是，練尖了耳朵的广大人民是不难辨別他們的弦外之音，也不难知道如何对待这种叫器的！

1957年6月18日

## “志士仁人”的傳統及其他

王造時說：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整個的階層來看，確是有着“志士仁人”的傳統。我以為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其實，在古往今來的歷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整個的階層”，更沒有一個統一的“傳統”。在他們當中，有看風轉舵、朝秦暮楚的一流；有利欲熏心，賣身投靠的一流；有抱殘守缺，頑固不化的一流；自然也有不少明辨是非、堅持正義，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仁人志士。

毛主席早已告訴我們，在中國知識分子之中，有代表“帝國主義文化”的勢力，有代表“半封建文化”的勢力，有代表“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勢力，更有“五四”以後代表中國革命力量的“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而且，即使在今天，“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開始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

題上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近凡個月來，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際情況，完全証實了毛主席的這些分析。

像王造時所說那樣的都有著“志士仁人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因而根本談不到什麼“過去對它估計不夠”。遠的不談，即以最近的事例來說，如王造時自己誣栽某些共產黨員“假借黨的威信和國家的名器，作了害黨害國的事情”；徐仲年袒稱“有些事真令人髮指”，並鼓動說：“大錯誤就得用大民主來糾正”。……這些，難道看得出一點“志士仁人的傳統”的影子嗎？這已無需我來下斷，每一個公正的讀者都可以解答。

這些奇談怪論，倒是証實了一點，那就是他們確有徐仲年所說的那股“帶坑臭”。這種“帶坑臭”包括著腐朽的政客野心 and 惡師的惡毒。例如，徐仲年公然說：“有些共產黨員頗像閻羅殿上戴着‘一見生財’的帽子的活寶；人民見了，焉得不‘敬而遠之’呢？”不知是哪些“人民”委託徐仲年來提出這番控訴的？我們倒很希望徐仲年能明白地舉出來！我看，恐怕只是一個徐仲年假借“人民”之名來表白他自己的心靈的秘密而已。戴着“一見生財”的帽子的無常，在傳說中是個鐵面無私的人物，專吊暗中作惡的人們的靈魂。徐仲年怕共產黨員像怕無常一樣，是否由於他除了做過張道藩的得力部下，辦過“中國文藝社”，在“正中書局”里出過不少“著作”這些眾所周知的事實之外，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徐仲年說，共產黨員在任何運動中，對於舊知識分子的

“評定”，都是“斷章取義，不問發展，不問聯系”。其實，黨是最重視一個人的發展，也不忽視過去的聯系的。只是，“發展”必須有目共睹，有事實可查，而不是聽他自吹自擂；而“聯系”則“好的”固不埋沒，“坏的”也決不含糊。爭取、團結知識分子都是每一個黨員的天職，但是分清是非——過去的和現在的，也是每一個黨員的責任。

1957年6月19日

## “宿怨”的来由

去年十月，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之后，施蛰存写了一篇“吊鲁迅先生诗并序”，在“序”里说：“忽忽二十余年，时移世变，日倒天迥；昔之殊途者同归，百虑者一致”。当时，略知过去文艺斗争历史的人们，对于他那样轻描淡写地把鲁迅和他的思想分歧，说成“识见偶殊”，似乎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对他还是抱着一线忠厚的期望，因为他总算承认了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动，二十年前的“殊途者”，今天已可能同归于一致。

可是，在七个多月之后，施蛰存在“才与德”一文中，却透露出了他的真情实感，那就是“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原来在施蛰存的心目中，二十余年的“时移世变”的结果，不在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sup>(1)</sup>广大人民真正翻了身，得到了解放，得到了胜利，<sup>(2)</sup>并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锻炼出了千千万万优秀的革命战士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在于“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这就彻底

地透露了施蛰存灵魂深处对二十年来中国的偉大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基本看法。戴着这一副特制的有色眼鏡去看当前的事物，自然就只看到“某些干部，品德之坏，在旧社会里都是駭人听闻的……”以及“老子打过游击”“不能算是德”之类了。

这副特制的有色眼鏡就是他們在二十余年之前戴上了的“第三种人”的眼鏡——这种眼鏡的国际“学名”就叫“純文学”。当时，鲁迅曾对这些人下过判決說：“文艺上的第三种人”“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無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这种“分明的显现”在施蛰存身上，二十余年以来已經不止一次兩次。首先，打出“第三种人”的旗号的“現代”杂志的出版，就不是在“不偏不倚”的状态之下进行的——当时的尖锐的政治斗争条件从来就没有容許什么“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之群”“在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第一着就是由“第三种人”中的一員大將向国民党“自动悔过”，并且保証这个書店除了出版“現代”杂志之外，同时出版反共的民族主义文艺月刊“前鋒”。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第三种人”的机关刊物“現代”才得以“順利”地出版。

接着，在一九三二年所打出的“第三种人”的旗号，自然也就不是在什么“不偏不倚”的条件之下，而是在国民党和托派联盟的代表人物胡秋原对“有党派的”左翼作家联盟进攻，向“左联”要“創作自由”的情况下，由杜衡做发言代表，在“欢迎”胡秋原的所謂“自由主义的創作理論”的前提之下对